

## 摘要

### 論文提要

#### 緒論

緒論的部份，首先回顧《鄭羲下碑》的研究史，重點在對前人研究的成果，作出歸納與批評。前中牽涉的議題，包括筆法的特徵，書丹者的身份，《下碑》與南、北朝書法傳統之間的關係等等。本文主要認為，由於一般對於《下碑》筆法的認識過於僵化，不但使研究者無法釐清《下碑》與其它書法作品之間的風格脈絡，也無法根據風格分析的結果來討論風格現象的背後，更深刻的歷史情境。因此，本文以研究《下碑》筆法的來源，作為主要的問題意識，並嘗試從北魏在政治制度，與文化氛圍轉變的角度，來解釋形成這些風格脈絡的因素。一方面可以真正的瞭解《下碑》在南北朝書史中的位置，另一方面，勾勒出北魏書法發展的趨勢。

第一章《鄭羲下碑》的筆法特徵及其來源概述由於研究方法的缺陷，導致前人經常忽略，摩崖碑刻在書法方面的藝術效果，具有相當的複雜性。事實上，《下碑》作為摩崖碑刻之一，它在拓本中呈現的書法風格，是先後經過書丹、刊刻以及外力破壞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之後，一種綜合的結果。因此，本文提出應該先排除後期因素的影響，才能逐步探尋筆法特徵的研究方法。

第一節 外力破壞對《鄭羲下碑》的影響 首先指出所謂的外力，包含有來自人為與自然的力量，再藉由實地勘查的經驗，結合局部性的比較，指出這兩種破壞，對碑面造成磨損的情形。本文認為關於自然風化的造成的破壞，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劇烈。事實上，它更小於人為力量的破壞。而人為力量的破壞，主要又來自於觀眾在閱讀碑文的同時，又對碑面任意進行「摩娑」。在長時期地經過這種破壞之後，目前的碑面，只有在碑額的大字，以及位於碑面左上角這個部份的刻字，能夠反映出新刻石的狀態。在釐清這些外力破壞的範圍與程度之後，才能以比較科學的態度，進行字例的取樣與分析。

第二節 刊刻《鄭羲下碑》的刀法 隨著近代書法研究水平的進步，刊刻刀法對碑刻書風的影響，已經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。只有先確定刀法能刻出筆寫的效果，才能進一步分析筆法的特徵。首先從《鄭羲下碑》的碑面保存良好的地方，觀察各種鑿刻的痕跡，並且據此分析刊刻《下碑》的刀法，然後指出當時北魏的刻工們，已經掌握了比較高明的雕刻技術。不同於「龍門四品」是以比較粗糙而簡略的刀法刻製，刊刻《下碑》的刀法，的確顯得

相當細膩與繁複。其次，再以北魏《大般涅槃經第40》(公元505年)與南朝梁《大般涅槃經第11》(公元506年)為標準，比較筆法與刀法之間的差距。由於墨跡與《下碑》之間，各種點與線條的型態有著同樣的特徵，然後才能確定在《下碑》中，各種以刀法刻出的點與線，仍然能保有筆法的效果。根據碑面的刻字來研究書丹的筆法，是一種合理的途徑。

第三節 《鄭羲下碑》的筆法特徵 從各種點的造形，以及橫、折肩與各種鉤等線條的型態，來歸納《下碑》的筆法。本文認為，其筆法特徵無法被納入前人所謂「方筆」或「圓筆」的系統，反而應該是一種「方圓兼備」的用筆技巧。其中的方筆，主要出現在各種線條的起、止兩端；而所謂的圓筆，主要又應用在行筆的過程，所以讓《下碑》中大部份線條的形態，都具有圓轉蜿蜒的效果。這種「方圓兼備」的用筆技巧，使其線條質感有如棉中裹鐵而剛柔並濟。

第四節 《鄭羲下碑》筆法的來源 根據上述筆法特徵，再將這些特徵與《持世經第一》(公元449年)、《金光明經》(公元471年)的比較，指出《下碑》中的「圓筆」技巧，最初是由南朝的行楷筆法影響所發展，在南朝書家把這種書體風格與筆法帶到北方之後，才逐漸被北朝的職業書手學習，並進而成為元魏宗室墓誌銘，以及《下碑》筆法的來源之一。此外，又根據《下碑》與《龍門四品》(約公元498年至505年)、《佛說菩薩藏經第一》(公元457年)、《大般涅槃經第十六》(約公元484年)等作品的比較，指出《下碑》的方筆，是繼承北方地區，「五胡書道」筆法的傳統。這種筆法，也使得《下碑》有若干的用筆，仍然帶有隸書筆法的遺痕，並且突顯出《下碑》作為北魏碑刻的特徵。

第二章 《鄭羲下碑》的書丹者 《下碑》書丹者的身份這個問題，牽涉著書家的書學來源、書家品評、南北書法交流等重要的書法史議題。所以自清代以來，研究者對此爭議不斷。本章即結合新的史料與更微觀的風格分析，針對該問題提出新的理解。

第一節 鄭道昭與《鄭羲下碑》 首先從鄭道昭任職於秘書省的經歷，並通過對《下碑》碑文語法的分析，本文指出碑文的「注篆」一語，並不能解釋為鄭道昭善於篆書，甚致是他以篆書的筆法，來為《下碑》書丹，而是指鄭道昭具有識讀、注解、籀或篆字的能力。其次，通過史料與碑文的交叉比對，考證出碑文在記述鄭羲仕宦的經歷時，有時間上的錯誤。由於鄭道昭應該相當瞭解其父成家與仕宦的過程，可見碑文不是由他書丹，否則不會出現這種錯誤。最後，再結合前人推測鄭道昭摩崖自己詩文的動機，進一步排除他是《下碑》書丹者的可能性。

第二節 北魏宮廷中的書家 從政府需要大量職業書手，在各級機關中抄錄行政文書，以及國家藏書的觀點，結合史料記錄的歷代官制，指出所謂「書吏」、「書手」、「寫書生」、「工書者」這些人，正是一批善於書法的低級官吏。而中田勇次郎等人所謂「北魏宮

廷中的書家」，也正是指這一批人。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以書法技能，在政府中擔任繕寫的任務，活動時主要又是聽從上級須要而隨事調遣，只要是須要應用到書法的場合，他們都應該會出現。所以，推測他們可能也就是元、魏宗室墓誌銘以及《下碑》書丹的人。

第三節 鄭道昭與北魏宮廷中的書家 本節首先從書風的排比，指出一般傳為鄭道昭書丹的摩崖，實際上應該是一群書風相近的書家，集體合作的結果。其次，由於這些摩崖與北魏在洛陽地區的碑刻之間，有共通的書風，本文推測這批書家來自中原地區。特別是由於鄭道昭曾數次擔任秘書省的高級官員，因此必定認識許多北魏宮廷中的書家。在他自己須要優秀的書法來摩崖時，他便集合這批書家來完成這項工作。

第三章 南風北漸的大時代 本章是從北魏漢化政策推動的情形來切入，描述元魏宗室、北方漢人世族、南方士人新貴，三者之間勢力之消長，以及造成北人仰慕南風的情形。正是在這種心態上，開啟南朝書風北漸，並影響北魏書法發展之勢。

第一節 元魏宗室文化水平的提高 本節從孝文帝接受的教育方式著眼，指出當時的北魏宗室，如：孝文帝本人，以及諸王如元澄、元勰等人，在經過長期與漢人世族接觸之後，漢化程度加深，文化修養提高的情形也正是這些人，成為推動北魏進一步漢化的中堅力量。當北方原有的漢文化，已經無法對這些人提供學習的資源，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漢化，一方面為了政治情勢的考量，孝文帝不得不推行激烈的漢化，也形成南朝文化北傳的關鍵之一。

第二節 北方漢人世族文化勢力的消退 根據史料的考察，本節指出北方的漢人世族，在推動孝文帝的漢化政策這方面，並沒有明顯政績。從這個角度來觀察，更指出這些北方的漢人世族，已經失去了他們長期擁有的文化優勢。北方的漢人們無法滿足孝文帝在政治上的要求，更形成南方士人崛起的另一個關鍵。

第三節 北來南士與南朝文化勢力的介入 相對於北方漢人世族文化勢力的消退，從南方北來的士人，例如：蔣少游、王肅、劉旭等人，積極地推動孝文帝的漢化制度，甚至藉著主導漢化政策的機會，努力掘起於北魏政壇，並且促成南方士人所帶來的南朝文化，在南北朝獲得主導性優勢的情形。尤其以王肅將流行於南朝的貴族喪葬制度帶往北朝的情況，更反映了南朝文化勢力對北朝的影響，已經是一種不可抵擋的趨勢。

第四節 墓誌銘文體所反映的南朝文化勢力 從墓誌銘文體的起源，指出北魏宗室墓誌銘的出現，可能是學習南朝貴族葬制的結果。由於墓誌銘的製作，必然牽涉著書法藝術的應用，在當時的北魏貴族，普遍有仰慕南朝文化的心態之下，北方宗室的墓誌銘書法，也開始出現了南朝書法的影響。

第五節 南風北漸之路 本節旨在根據史料的記錄，歸納南朝書風往北魏傳播的方式。首先，在人物方面，整理出14位南朝出身的書家，以及他們進入北魏之後的活動情形。其次，在物的方面，指出藉由非書家的活動，包括各種流動人口與政府，透過戰爭 貿易等手段，將各種南朝書籍，大量帶到北方。由於書家與書籍，都可作為書風的傳導體，當這兩種傳導體進入北方，也就代表南朝書法的北傳。

第六節 南朝書法在北魏的流行 本節首先指出：北魏的貴族在仰慕南朝文化的心態之下，會普遍建立對於南朝書法的認同，並且以這種認同，來要求北魏宮廷中的書家進行書法實踐 為了保有工作的機會，這些書家也不得不盡力學習南朝的筆法 當這些曾被召入宮中的書家，再次回到社會上的抄寫市場，其他的書家為了爭取進入宮廷中服務的機會，就不得不向他們學習這種流行於宮廷中的書法風格，以滿足北魏貴族的書法好尚。南朝書風在這種投上所好的心態中，才得以被落實在各種北魏的碑刻書法。

## 終章

### 第一節 餘論

本節主要提出鄭道昭是以贊助者的身份、以追求政治利益為目的，才製作了包含《下碑》在內的大批摩崖刻石。只有通過這個觀點，才能打破在已往的研究中出現的各種矛盾，並且正確地瞭解鄭道昭與《下碑》之間的關係，以及鄭道昭的書史地位。

### 第二節 結語

《鄭羲下碑》在書風方面，有著融合南北筆法傳統的特性。這種特性，同時也體現南朝書法影響北魏書法發展的情形。由於政治與文化氛圍的改變，促使北魏貴族們對南朝書法建立認同感。並藉著類似於雇傭的機制，使南朝書法得以在北朝地區普遍地流行，而《鄭羲下碑》正是這種潮流下的產物。鄭道昭作為北魏最高級的知識份子與貴族，藉由製作數量龐大的摩崖刻石，不但表現了他在政治、文學、經濟上的雄厚實力，也展現出他對書法的好尚。《鄭羲下碑》作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，最能反映當時在北魏地區，以貴族的品味為指導，以職業書家的技巧來實踐，這樣的書法發展模式。其書史地位，自然也不容忽視。